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 吴 迪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旋律、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逻辑、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深刻变化,叠加世纪疫情及长期积累的全球化负面影响,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停滞化、区域化、服务化、绿色化趋势。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塑造绿色开放竞争优势、打开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门带来了重要机遇,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对外开放难度。为推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高质量共建区域价值链、推动多双边贸易合作、优化外资营商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等多方面着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四化”趋势;高水平对外开放;数字经济;区域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3)02—0015—10

引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全球价值链快速扩张,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顺应开放潮流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增加值第一、货物贸易总额第一的新兴大国。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进入了深刻调整期,全球化逆势凸显,全球价值链高速扩张态势逐步收缩。当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的暴发深刻改变了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底层逻辑,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大国博弈将经济贸易问题逐渐政治化,时空交叠的多重因素不断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加复杂更加多元的方向重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准确刻画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需要深刻把握并理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趋势以及对我国带来的机遇挑战。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围绕全球价值链重构问题做了大量研究。部分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呈现较为明显的收缩化态势^[1-3]、区域化程度加深^[4-5]、无形资产的优势逐渐凸显^[6]。而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动因包括新一轮科技革命、经济特征、政策环境、数字经济、世纪疫情、气候变化等因素^[7-10],其他问题与挑战也在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全球化的参与主体、手段、方式和标准^[11-12],甚至可以改变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比较优势^[13-14]。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我国可以凭借部分领域的技术优势、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大潜力的消费市场等优势赢得重要机遇^[15-16],积极开展区域化合作^[17-18]。现有研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相关问题的探究较为丰富和深刻,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

作者简介:吴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助理研究员。

基础,但是仍然在某些方面存在欠缺:一是已有研究对全球价值链的趋势总结得尚不全面;二是现有研究较少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面临哪些具体的机遇和挑战进行论述;三是从客观角度看,面对美西方国家的打压以及区域合作中的机遇,我国在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应该主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鉴于此,本研究尝试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为我国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以及对策,为我国在新时代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

(一)全球价值链增长出现停滞化

全球价值链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公布数据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前 10 年,全球价值链高速增长,2000—2010 年,全球总出口额年均增速高达 8.7%。2010 年以来,全球价值链逐渐转向中低速增长,2010—2019 年,全球总出口额年均增速仅为 3.7%,相较高速增长长期下降 5 个百分点。

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全球价值链延长速度与全球价值链增长的变化态势趋同。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来看,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公布数据显示,1995—2008 年,基于贸易测算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 35.2% 上升到 46.1%;2010—2020 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一直保持疲软增长态势,并在 2020 年出现大幅下降,2020 年,该值降为 44.4%。从全球价值链长度来看,全球价值链长度增势明显回落。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公布数据,2000—2010 年,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普遍延长,行业均值由 2000 年的 7.9 延长至 2010 年的 8.5;2010—2019 年,全球价值链长度延长速度趋缓,行业均值始终保持在 8.5 左右。

(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布局态势愈发凸显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持续增加,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布局快速加深。区域贸易协定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期,如图 1 所示,2021 年,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激增,货物贸易协定增加 43 个,服务贸易协定增加 22 个,是有史以来当年生效的贸易协定数量最多的年份。截至 2021 年底,累计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通知达 579 个,累计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达 355 个,分别是 1990 年的 21 倍、16 倍。区域贸易板块逐渐形成。据 2022 年世界贸易组织公布数据,全球已形成欧盟、东亚、南美、北美等区域经济贸易体系,截至 2022 年 11 月,参与的生效区域贸易协定通知最多的地区是欧盟,数量达到 160 个,占全部比重为 27.5%,东亚 17.4%,南美 12%,北美 8.6%。

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上升,区域贸易网络密集度不断增强。借鉴 F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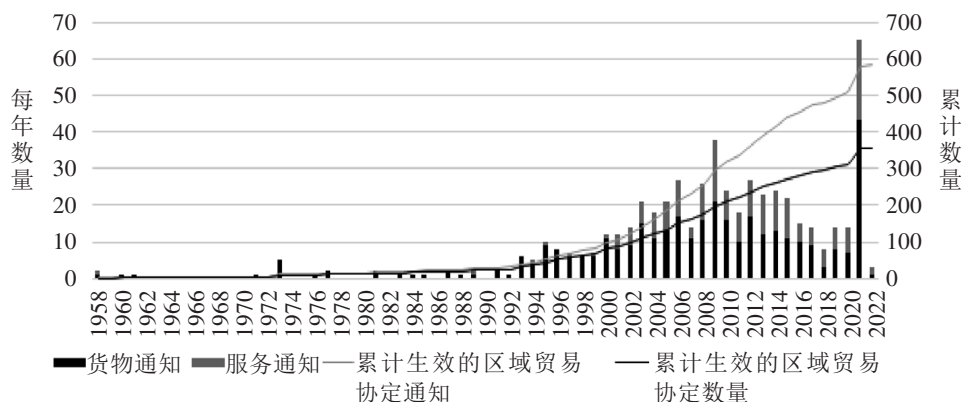


图1 目前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情况(根据生效年份)(1958—2022年)

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rtais.wto.org/UI/charts>)数据整理,2022年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1月12日。

kel提出的区域集中度指数^{①1972}，本文采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公布的各国货物贸易数据，分别测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3、欧亚经济联盟、欧盟28国^②等四大区域化经济体系的区域集中度指数。欧盟28国的区域集中度指数显著高于其他三大区域经济体，1998—2021年期间稳定保持在0.6左右。其次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集中度指数长期保持在0.4—0.5左右水平，东盟+3区域长期保持在0.4左右，欧亚经济联盟长期保持在0.1—0.2之间的水平(如图2所示)。2021年，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转变最为深刻，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集中度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从0.34上涨至0.50，涨幅高达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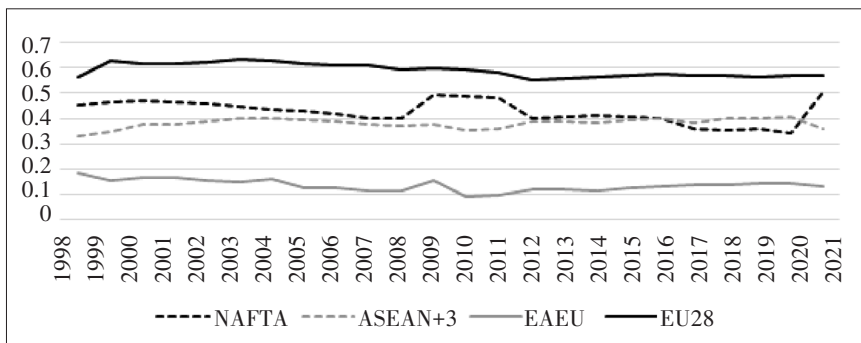


图2 1998—2021年全球四大区域经济体区域集中度指数变化趋势

注：数据根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计算而得。因贸易服务数据截至2016年，本文仅对四大区域经济体国家内的货物贸易进行测算，不包括服务贸易。

企业通过向全球客户出口无形资产服务获取高额收益。获取无形资产带来的高额收益有两种方式，一是生产驱动，主导企业具有技术优势，通过生产投资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7]。生产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往往在生产前端的设计研发阶段获取高额收益，相关研究发现，以汽车、金属制品和其他运输设备等为代表的生产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无形资产获益占比高达60%^[20]。二是消费驱动，主导企业具有强大的品牌优势和国内外销售渠道，通过全球采购等方式组织全球商品流通网络，以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为主。消费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获取高额收益往往集中在生产后端的消费环节，占比高达50%^[20]。

无形资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和贡献度持续提升，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焦点。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框架下，无形资产服务贸易未被计入在内，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公布数据，在考虑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要素收入贸易”框架下，计入与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有关的“缺失价值”，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可能是传统贸易统计框架下的2倍。若使用要素收入贸易框架重新估算中美贸易差额，则中美贸易顺差比现行总贸易额统计体系下的数值要减少约1/3，且也比增加值贸易统计框架下的估值低17.4%，可见以无形资产为核心的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四)绿色化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趋势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出现频次明显增加，据澳大利亚气候学专家表示，目前全球公认的15大气候临界问题中已有9个被触发，包括大西洋翻转环流、冰川融化和永久冻土层解冻等，将对全球气候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冲击，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全面推动绿色转型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路

①区域集中度指数指区域内贸易与该区域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比率，若该数值越接近1，说明该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度越高，较为依赖区域内国家的货物供给，可以认为区域贸易集中度较高。

②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参与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东盟+3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五国。欧盟28国包括欧盟和英国。

径,更是国家发展规律的必然性选择。2018—2021年,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我国积极彰显大国使命与担当,于2020年提出要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在实现碳中和上达成共识,将对各国制定发展政策起到标杆性和引领性作用,这一目标的分解和落实,将会在中长期内改变全球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改变全球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人民生活等的底层逻辑,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零碳发展,坚持绿色采购和生产,积极构建绿色价值链。例如,欧盟自愿伙伴关系协定(VPA)、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PTPA)等均规定木材来源合法,保护森林资源。

三、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因素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改变了全球价值链附加值的分布

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深刻改变了国际分工体系。目前,以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AR、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从三个维度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一是生产环节智能化改造提高了整体附加值水平。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全球价值链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制造环节生产效率,提升产品附加值。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催生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了产业制造的服务内容,延长了生产工序,生产加工变得更加精密化、复杂化、智能化,使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间加工制造环节更加平缓、附加值更高。二是数字化发展提高了全球价值链两端附加值占比。在前端研发设计环节,机器学习可提供更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减少研发人员的学习成本,提高研发效率;数字技术可提高研发人员掌握潜在市场的便利度,促进更多实际需求较强的应用型技术落地。在后端销售、物流、售后环节,数字技术为供应商、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构建了信息网络,促进形成集成供应链生态系统,厂商可及时调整生产、销售、库存计划,快速在不同区域间调配货物,降低管理物流成本。在线交易平台可有效匹配供需两端,提高贸易效率,并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刻画销售数据,精准降低营销成本,提高销售效率,为客户提供贴心及时的售后服务。数字化技术会推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得到极大提升(如图3所示)。三是数字技术可降低全球价值链门槛。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口岸向电子化、无纸化方向发展,通过建设大量的“单一窗口”可以减少繁琐的通关流程、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开展小额、高频率贸易提供更多渠道^[8],同时也为离岸外包和远程操作提供了便利^[9]。但是,数字技术也将改变各国要素比较优势,或将固化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在全球价值链附加值上的差距。人工智能会削弱具有丰富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可能降低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会强化数字技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弱化新型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国家的话语权,短期存在加剧全球价值链不平衡问题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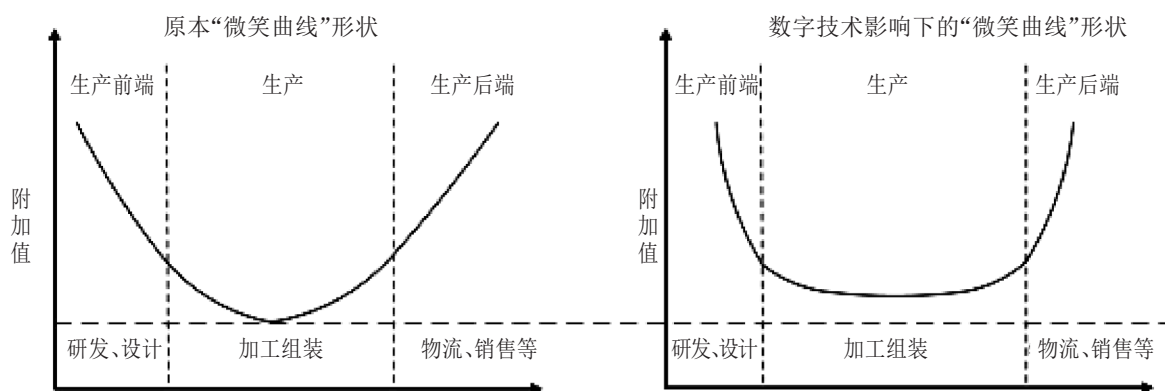


图3 数字技术改变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分布对比图

(二)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发生改变导致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逻辑重构

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经济实力“东升西降”趋势明显,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科技、安全、文化等将产生深远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2001—2021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1.15%上升至40.92%,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78.85%下降至59.08%。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快于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实力此消彼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逐渐提高,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都会发生深刻调整。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价值链走向区域化。据全球贸易预警平台公布数据,2009—2021年,全球出台的贸易保护性措施每年持续上涨,出口补贴、外商直接投资限制、许可证限制等监管措施纷纷出台,尤其是进入2019年之后,贸易保护性措施进入快速车道,2021年,新出台的贸易保护性措施超出自由化措施6倍左右。贸易保护不仅可增加自由贸易难度,提高贸易成本,显著降低贸易福利^[21],也会沿着全球价值链扩散到更广泛的贸易主体。为规避贸易壁垒,多数国家会考虑更多安全性因素、稳定性因素和确定性因素,将对外活动向本土转移或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导致全球价值链向本土化、区域化转变。

大国博弈愈演愈烈,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各国贸易政策由更加注重合作共赢转向战略竞争,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布局。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复兴其自身产业竞争力,通过对华发起贸易战阻滞我国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拜登政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政策,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保障供应链安全为战略目标,从全球、区域、双边三个层次展开产业外交^[22],以“在岸生产”和“友岸外包”两种策略为核心,拉拢盟友重新建立以制度融合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经贸规则^[23],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试图将我国从全球供应链网络中剥离,强行改变完全由市场驱动的全球产业布局。同时,地缘政治冲突诱发了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使很多国家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升到关系生存和发展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关于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内顾”倾向明显,纷纷想掌握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自主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程度加深。

(三)世纪疫情成为改变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推手

世纪疫情致使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收缩幅度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0]。一方面,世纪疫情放缓了全球价值链增长速度。疫情期间,停工停产、运输中断、服务业暂停等现象频发,全球经济难以正常运行,致使全球价值链萎缩^[17]。为避免经济过快衰退,世界各国出台空前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全球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增加了更多金融风险隐患。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导致行业间收入和未来发展空间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从深层次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例如科技行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通过提供线上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市场份额,盈利颇丰;而制造业和餐饮等服务业却因招工难、经营成本增高、没有营收交不起房租等各种困难出现停工停产和倒闭潮。另一方面,世纪疫情加剧区域化发展态势。疫情助推了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由更加注重效率转向更加注重安全。各国充分意识到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性以及供应链过于集中的风险性,为了保证经济安全,部分发达国家纷纷将制造业回迁,积极推动区域价值链重构,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在大变局之下也会积极寻找强大的区域贸易伙伴,以抵御外部风险和维护自身利益,这为我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来重要机遇。

(四)全球化负面影响长期积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球化“逆向”演进

2009—2021年,全球实施的可影响跨境贸易、投资、数据流动和劳工移民的政策共计35389项,81%的政策会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负面冲击^[24],致使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出现停滞。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种问题,斯蒂格利茨、巴格瓦蒂和罗德里克等对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环境污染、收

入不平等^[25-26]、公共治理缺位和劳工妇女权利等问题都有相对深入的研究。经济全球化产生了显著的收入极化效应,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以及各国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同样折射出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失灵”,即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整合速度过快,会放大技术进步的收入极化效应,由于全球化运行机制和治理模式的单一与教条,不仅会固化不同国家及各国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趋势,还会压缩国内政策发挥效用空间^[27]。经济全球化由此积累的种种负面影响,给民粹主义右翼势力机会掀起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诸如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美对华的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大国博弈加剧、发达国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全球价值链势必会在此轮逆全球化浪潮中曲折重构。

四、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及应用增加了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长点

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优势较强,数字化发展将重塑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一是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攀升。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云计算市场。二是我国的数字贸易发展迅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的服务贸易总额高达359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3%,高于全球同期14.3%的增速水平。三是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截至2022年7月,我国已建成的5G基站占全球总数超过60%,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28]。四是我国数字平台企业较强。我国建立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全球性数字平台,收集的全球数据经过存储、处理、分析及应用可形成数据要素优势,掌握全球价值链话语权。五是我国数字技术取得了较大成就。我国在类脑计算芯片、量子计算原型机及碳基集成电路等基础前沿领域实现了0到1的原创性突破。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近40%,其中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等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前列。

我国数字技术优势可转化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动能。一是数字技术在全产业链应用,可构建全产业链运营的数字映像^[8],优化物流运输规划,构建供需两端信息桥梁,提高全产业链运营效率。二是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为中小企业开展高频次小额化的贸易提供可能,为我国更多市场主体提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三是催生出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借助数字技术,可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货物贸易,传输数字产品和服务,甚至提供生产所需的数据要素,催生出产业互联网等新型贸易活动。四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可打造富有柔性和弹性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对外部冲击及时响应并作出调整,拓展供给渠道,提高供应链韧性。

(二)绿色化发展有助于重塑我国绿色开放竞争优势

我国实现绿色化发展具备较强支撑动能。目前已经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势必要围绕能源转型和绿色创新展开新一轮竞争,掌握碳市场交易和绿色标准体系的话语权对我国尤为重要^[10]。近年来,随着我国绿色创新投入持续增加,超大规模市场提供迭代应用场景,我国实现了部分领域绿色低碳技术的“并跑”和“领跑”^[15],基本建立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为赢得绿色标准体系及碳交易话语权提供了有力支撑。并且,随着全社会全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动,我国合理有序地淘汰了部分高耗能行业,着力推动新一轮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出一批可再生能源、绿色循环、绿色物流等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参与全球绿色价值链注入新动能。同时,创新驱动和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将重塑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核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危机、世纪疫情等导致全球爆发了能源和粮食危

机,相比全球气候这个更长远、更抽象的问题,目前更多国家关心的是如何度过眼下能源危机,尤其是面临能源“卡脖子”的欧洲,在缺油少气情况下,短期内不得不转向传统能源。例如,丹麦在2020年计划停止生产化石燃料,在近期却加大北海油气开采力度。2022年6月,荷兰宣布将与德国在北海联合钻探一座新的天然气田,英国政府批准壳牌公司重启开发“寒鸦”(Jackdaw)天然气田项目,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进程或将放缓。在此背景下,我国更应坚持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三)布局调整为我国打开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门提供重要机遇

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发展为我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窗口期,将重塑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面临发达国家“去中国化”意图以及各国区域合作需求,我国应顺应发展趋势,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由以东部地区开放为主逐渐转向同时推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双向开放,要以推动中西部积极参与并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的开放平台、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等重大任务为主要方向,进一步打开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截至2022年10月中旬,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6.1万列,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204个城市。我国中西部地区外贸总额有显著提升,占全国比重由2013年的12%提升至2021年的17.7%。

RCEP区域贸易协定将进一步放大我国规模优势和后发优势,同时推进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RCEP的签订为我国深度参与亚太地区生产网络系统提供了重要契机,将通过创新效应和贸易效应推动我国引领亚太区域价值链的融合与发展^[18]。RCEP为我国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内陆开放和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将有力促进中西部地区优势产品出口,提高外商投资吸引力。同时,东部地区将会增强与区域协定成员国在生产、外贸、投资以及研发等全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

(四)区域化态势固化将增加我国对外开放难度

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增加了我国贸易转移、投资转移和产业转移风险。一是随着区域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固化,我国外贸订单将被转移。据海关统计数据,2022年11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下降了8.7%。美国财经网站CNBC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初,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与我国的贸易总额,美国在我国的订单减少了40%。二是东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税收优惠、关税优惠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美西方发达国家布局制造基地的首选,并与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形成竞争之势,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金额持续下降,而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数量持续上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由2015年的204亿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198亿美元,而同时期,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总额由1260亿美元增加至1750亿美元,约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9倍。三是各国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致力构建区域产业链和弹性供应链,增加我国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风险。例如,美国为提高本土制造能力,投入4000亿美元鼓励购买美国商品,并加强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供应链合作,减少对我国制造业依赖。日本拨款22亿美元鼓励在华日企回国,提高多元化供给能力,抢占全球市场份额。

区域联盟的建立会增加我国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的难度。一是贸易壁垒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美西方国家将针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贸易壁垒同时瞄准我国境外企业,阻断我国参与全球贸易途径。以轮胎行业为例,自2007年开始,美国、欧盟对我国轮胎企业实施相关调查和“双反”调查,为规避贸易摩擦,我国轮胎企业在泰国、越南设厂,随之,美国持续拓宽制裁范围,于2021年7月12日公布了新一轮针对越南、泰国的“双反”调查终裁税率,导致我国部分在越南设厂的轮胎企业将额外承担更多关税,据调研,玲珑轮胎和森麒麟在泰国的工厂将额外承担17.08%的关税,赛轮轮胎在越南的工厂将额外承担

6.23%的关税。二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项目面临安全审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并时刻密切关注我国对外投资动向。审查范围逐渐扩大,审查程序更加严格,审查期限进一步延长。尤其对国有企业的审查标准更加严格,对高技术及资源密集型的并购审查力度增强。三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空间不断被压缩。部分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常常无理泛用“维护国家安全”之名,干扰我国企业正常对外投资活动。如近期加拿大声明要求三家我国企业撤出对加拿大矿产企业投资。如果全球范围内有更多国家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不仅可较大程度压缩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范围,也不利于我国获取能源资源、维护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五、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提质升级,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一是充分利用我国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技术。加快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制造业向高级组装加工、核心零部件制造、研发设计等微笑曲线前端集聚升级,夯实强大国内市场的技术根基和产业根基。二是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链主型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建立多级联动机制,完善监测预警工作体系。加强重大项目管理和规划引领,重点关注对可能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的境外投资项目,全力留住企业,并做好应对发生外迁的相关工作。加强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监督及潜在风险排查力度,将国内劳动密集型龙头企业纳入重点监测范围。

(二)多措并举,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一是集中力量攻克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集中力量实现原创新突破;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集成电路、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建设新型创新主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颠覆性技术创新策源地和制高点。推动数字技术与其他技术及实体经济向横向和纵向交叉深度融合,拓展应用空间。二是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5G运用领域和规模,优化IPv6性能,精准对接需求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完善全国大数据体系。强化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全领域实现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改造。三是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法规。健全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合理适度监管平台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保护信息安全、提升市场效率,引导平台经济企业合规合法经营,维护好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框架,推动市场化、法制化、数字化协同创新监管模式,营造良好的法制监管环境。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持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发展规则和标准制定,提高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保障我国数字贸易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对外交流合作。

(三)以开放合作为基本准则,进一步打开对外开放大门

一是高质量共建区域价值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提高中欧班列开行质量,推动国际陆运贸易规则制定。紧抓RCEP机遇充分挖掘成员国合作潜力,重点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建高水平三边合作机制,聚焦中高端产业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积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有序推进我国传统制造业向其他RCEP成员国转移,构建互补合作联盟。二是推进多双边贸易合作。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我国

进博会、广交会作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要素流通和升级,放宽市场和行业准入,着力引进先进装备、高端服务和优质国际人才,提升国内市场竞争水平,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三是鼓励我国企业继续走向美西方发达国家。支持国内企业发扬“钉钉子”精神,在合理合规合法前提下,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企业在高端制造、战略性资源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四)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提升外资利用水平

一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与服务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变革。在多双边合作中呼吁并推进服务贸易在各国合理化、自由化发展,减少服务贸易繁琐程序。优化国内市场规则,降低服务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壁垒。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规和规章制度,清理不合规条例。保障外资准入后的公平待遇,在政府采购、土地供应、税费减免、项目申报、人力资源等方面与国内企业一视同仁,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持续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深化对内改革,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投资环境。对有助于产业链安全稳定的外资龙头企业加大用工、财税、防疫等支持力度,营造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外商投资信心。聚焦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提高外资吸引力,鼓励外资积极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重点围绕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等领域部署重大外资项目,积极引导外资参与我国建设制造强国。以国家重大外资项目为引领,带动地方完善体制机制,实现上下联动。

(五)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构建全球绿色价值链贡献中国力量

一是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筹划设立绿色价值链高层协调机制,推动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二是系统推进工业、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绿色转型。加快推进工业制造业领域完成绿色化改造,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清洁生产评价,推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加快燃料原材料清洁替代。推动农业生产投入品减量,提升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水平,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绿色低碳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服务供给能力。逐步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依赖,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创新金融工具促进绿色经济实践。向符合绿色绩效标准的生产商、制造商和贸易商提供低利率或快速支付发票等创新贸易融资。

参考文献:

- [1]杨丹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与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J].全球化,2018(10):62-73.
- [2]MCKINSEY.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EB/OL].(2019-1-16)[2022-12-22].<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
- [3]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37(1):1-19.
- [4]张辉,吴尚,陈昱.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动力及中国应对[J/OL].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4):54-67.
- [5]BALDWIN R, LOPEZ-GONZALEZ J. Supply-chain trade: A portrait of global patterns and several testable hypotheses[J]. The world economy, 2015(11):1-39.
- [6]DURAND C, MILBERG W. Intellectual monopoly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27(2):404-429.
- [7]张辉.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J].中国工业经济,2006(1):40-48.
- [8]杨继军,艾玮炜,范兆娟.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的场景、治理与应对[J].经济学家,2022(9):49-58.

- [9]李晓华.数字科技、制造业新形态与全球产业链格局重塑[J].东南学术,2022(2):134-144.
- [10]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36(12):1-13.
- [11]马 颢,黄建锋.数字技术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经济学家,2022(5):48-57.
- [12]江小涓,黄颖轩.数字时代的市场秩序、市场监管与平台治理[J].经济研究,2021,56(12):20-41.
- [13]于丽娜,闫 肃,孙雅秀.信息化嵌入对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20):137-148.
- [14]吕 越,陈 帅,盛 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J].管理世界,2018,34(8):11-29.
- [15]郭春丽,易 信.“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机制、趋势特征及对策建议[J].经济学家,2022(7):24-33.
- [16]杨丹辉,渠慎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J].经济纵横,2021(3):61-71+2.
- [17]屠新泉.“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应对[J].当代世界,2022(6):27-31.
- [18]索 维,张 亮.RCEP、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中国的应对策略[J].江苏社会科学,2022(5):127-134.
- [19]FRANKEL J A.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M]. Washington:Peterson Institute Press,1997.
- [20]CHEN W,LOS B,TIMMER M P. Factor incom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The role of intangibles[R/OL].[2022-11-15].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5242/w25242.pdf.
- [21]ANTRAS P, DE GORTARI A. 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Econometrica,2020,88(4):1553-1598.
- [22]李 巍.友岸外包:拜登政府产业外交新思想[J].文化纵横,2022(5):8-11+M0003.
- [23]黎 峰.逆全球化浪潮:内在逻辑、发展前景与中国方略[J].经济学家,2022(11):52-61.
- [24]EVENETT S,FRITZ J.Subsidies and market access:Towards an inventory of corporate subsidies by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EB/OL].(2021-10-29)[2022-11-15].<https://ishare.iask.sina.com.cn/f/tviRYaJvG5f.html>.
- [25]HARRISON A, MCLAREN J and M S MCMILAN. Recent findings on trade and inequality[J].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1(3):261-289.
- [26]HELPMAN E.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EB/OL].(2016-12-01)[2022-07-24].<https://www.nber.org/papers/w22944>.
- [27]盛 斌,黎 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与反思[J].中国经济问题,2020(2):3-15.
- [28]王 政,韩 鑫.我国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N].人民日报,2022-02-08(02).

(收稿日期:2022-12-05 责任编辑:李俭国)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Opening Up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Wu D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ain theme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the target function of policy formulation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adjustment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epidemic of the century and the long-term accumulated negativ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have led to the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howing trends of stagnation, regionalization, service orientation and green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ring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develop digital economy, shape green and ope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open the doors of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the outsid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er level, we should start from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strengthening the digital economy, building regional value chains with high quality, promoting multi-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so a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changes and turn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Four Trends";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Value Chain